

# 论先秦两汉时期《诗》本事<sup>\*</sup>

曹建国

**内容提要** 先秦两汉时期有大量的《诗》本事产生。它们或出于史书，或系诸子杂说，有的甚或出自志怪小说，且多为托古言事之作。《诗》本事既是一种经学阐释手段，也是一种文学解读的方法，同时又是具有丰富文学性的故事文本，具有经学、文学等多重价值。

**关键词** 《诗经》本事 托古言事 经学价值 文学价值

“本事”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如《管子》、《荀子》等，然意义多为农桑之事，与本文所说的“本事”不类。本文所说的“本事”意指一段史实或一个具体的生活事件，与之意义相仿佛者最早当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春秋》类”序文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sup>①</sup>是以按照《汉书·艺文志》之言，《左传》便是匹配《春秋》经文的本事，其意在于解经。《公羊》、《穀梁》虽主义理，亦间或言及史事，也可以看作是本事解经。不惟《春秋》，《诗》亦有本事。先秦两汉典籍中又记载了许多《诗》本事，如《左传》、《列女传》，此外还有几乎全用本事解《诗》的《诗序》。这些本事多记载诗之时代、作者或作诗之由，它们或真或伪，甚至饱受诟病，如《诗序》。然而真的《诗》本事有价值，伪《诗》本事亦有价值，正如著名史家陈寅恪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sup>②</sup>而就《诗》本事而言，其本意在于诠释《诗》之本义。然而如何诠释以及诠释背后的东西，构成了“《诗》本事”丰富的内涵，赋予其思想史，乃至经学、文学等诸方面的价值。

## 一 《诗》本事之文献考略

欲论《诗》本事，先考其文献之类型并略论其真伪，斯为讨论之基础，亦陈寅恪先生论文献真伪之要义也。

古人云“六经皆史”，故《诗》有史衣。《诗经》的《雅》诗绝大多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有些诗甚至还标明了历史事件，如《正月》提到了褒姒，《十月之交》也提到了“艳妻”及其他大臣，《瞻卬》提到了“哲妇”。诗中的“艳妻”与“哲妇”也都喻指褒姒，而这些人名为《节南山》、《十月之交》、《正月》、《雨无正》以及《瞻卬》、《召旻》等诗篇提供了年代学上的证据，证明它们都作于西周灭亡的前夕<sup>③</sup>。《六月》、《嵩高》、《烝民》、《常武》、《江汉》等诗提到了周人与玁狁、淮夷之间的战争，以及尹吉甫、召穆公等人物，也同样为诗的断代提供了证据，这些诗当作于周宣王时代。诗的年代学证据为后世的解说提供了内证的支持，故后世的说解并无异词。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唐以前《诗经》的文学性传播与接受研究”（05CZW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班固《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15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③ 李峰《西周的灭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45页。

相对来说,大部分的《风》诗史事不明或无法明之,类似《召南·甘棠》、《秦风·黄鸟》这样史事明晰的诗篇极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诗》本事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关于《风》诗的。根据其文献来源,《诗》本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曰“春秋类”,二曰杂说类,三曰志怪类,四曰琴曲类。

所谓的“春秋类”本事即史书所载之《诗》本事,主要见诸《左传》、《国语》。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赋《硕人》。闵公二年记载狄人灭卫,许穆夫人赋《载驰》以吊。

《国语》也记载了一些《诗》本事,如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勿伐犬戎,引《周颂·时迈》曰“周文公之颂”,明《时迈》为周公所作。《国语》也记载了召穆公与《常棣》之间的关系,但《国语》记载召穆公只是赋周公作《常棣》,与《左传》不同。这说明在《左传》、《国语》的成书年代,关于《常棣》作者问题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杂说类”即诸子、传记类文献记载的《诗》本事。诸子之书,如《孟子》、《墨子》、《吕氏春秋》等都记载了一些《诗》本事,而传记之书如《韩诗外传》、《列女传》记载《诗》本事更多。其中记载《诗》本事较多的杂说之书,当首推刘向编纂的《列女传》。《汉书·刘向传》载:“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sup>①</sup>《列女传》记载十一则《诗》本事,内容涉及《关雎》、《采芣》、《汝坟》、《行露》、《邶风·柏舟》、《燕燕》、《式微》、《载驰》、《硕人》、《大车》、《渭阳》等篇。其次如《韩诗外传》、《说苑》、《新序》等也有一些《诗》本事,如《新序·节士》记载伋之傅母恐伋、寿将死,闵伤之而作《二子乘舟》。需要强调的是,《诗序》全以本事说诗,可谓集先秦两汉《诗》本事之大成。推其渊源,考其性质,也多是“取《春秋》,采杂说”。如《左传》、《国语》记载的《诗》本事,《诗序》悉数采纳。其说《召南·行露》与《韩诗外传》、《列女传》相同,说《邶风·二子乘舟》也与《新序》相同。

“志怪类”是指出自异闻类小说的《诗》本事<sup>②</sup>。“志怪”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作为一种文体,其出现应该在先秦时,如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便被认为是一篇志怪小说<sup>③</sup>。异闻志怪也有被用以说《诗》者,如《韩诗》说《周南·汉广》便属此类。许慎《说文解字》:“魑,鬼服也,一曰小儿鬼。从鬼支声,《韩诗传》曰:郑交甫逢二女,魑服。”<sup>④</sup>许慎所说的郑交甫逢二女事乃《韩诗》对《汉广》的解说,而李善注郭璞《江赋》引《韩诗内传》更为具体,其曰:“郑交甫遭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sup>⑤</sup>这种说法在汉代流传一定很广,如《列仙传》所载此事与《韩诗内传》基本相同<sup>⑥</sup>。《易林·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sup>⑦</sup>以及张衡《南都赋》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sup>⑧</sup>,说的都是同一个故事。由于三家《诗》已亡佚,尤其是《齐诗》、《韩诗》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志怪类《诗》本事,已不得而知。

“琴曲类”是指出自汉人琴曲解题中的《诗》本事。题名蔡邕的《琴操》中有古琴曲五首,分别是《鹿鸣》、《伐檀》、《驹虞》、《鹊巢》、《白驹》。每首琴曲前有解题,说以本事,如“《驹虞》者,邵国之

① 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7册,第1957—1958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把小说分为三类:杂事、异闻、琐语,其中异闻类小说便是指《山海经》、《汉武故事》、《搜神记》之类。更为详尽的考述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之《志怪叙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8页。

⑤ 《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72—573页。

⑥ 李善注阮籍《咏怀诗十七首》,《文选》,第1068页。

⑦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452页。

⑧ 《文选》,第150页。

女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时,不失嘉会”<sup>①</sup>之类。尽管作为汉代琴曲的《鹿鸣操》等与先秦歌诗的《鹿鸣》不同,但汉人对采自《诗经》的琴曲解说还是会受到汉代《诗经》学的影响,如《琴操》对《鹿鸣操》的解说便与《鲁诗》相同。

以上我们对先秦两汉典籍所见《诗》本事作了大致的分类。然而该如何看待这些《诗》本事之真伪呢?是否每一《诗》本事都实有其事呢?回答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区别对待。《诗》篇本身背景明确,后人又据之以说,这样的本事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如《甘棠》之类。而诸子、传记所载本事可能绝大多数属伪托杜撰,此盖如蒙文通先生所言:“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而依托之书遂猥起于战国之季。”<sup>②</sup>以《列女传》为例,其记载十一则《诗》本事,基本上可以断定都属杜撰。如《王风·大车》,《列女传·贞顺篇》曰:“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息君夫人即息妫,《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其与楚文王生堵敖与成王,与《列女传》记载不同。而《列女传》记载楚文王灭息之后如何虐待息君,实际上据出土息国青铜器,楚灭息之后对息仍非常善待,息君也没有失去封号<sup>③</sup>。此外,息人之诗出现在《王风》中,如同《新序》记载《黍离》为卫人之诗一样,也不合情理。

记载于史书中的《诗》本事也需一辨,不排除其中有虚假本事。如《常棣》作者,《左传》曰召穆公,《国语》曰周文公,这其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为伪。同样,《尚书》为经,其记载本事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如《尚书·金縢》记载周公作《鸛鸛》就颇让人生疑。虽然今古文《尚书》都有《金縢》篇,但自汉代以来,围绕《金縢》便争论不断。今文家把雷电示警说成周公死后,如《尚书大传》、《白虎通》以及何休《公羊解诂》都是如此。而古文家认为周公因管蔡流言而避嫌居外、成王信谗后,便出现雷电示警。而《史记·蒙恬列传》又说周公欲代之人不是周武王,而是周成王。《尚书序》则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凡此种种,歧异纷纷。蒋善国先生将其总结为:风雷示变,生死有别;周公请以身代,武王、成王不同;周公避流言,居东与奔楚相异;居东与东征是一事,或是两事<sup>④</sup>。正因为有诸多歧异,故《金縢》篇被人疑为伪作,如《二程遗书》卷二二记载:

又问:“《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问:“有此理否?”曰:“不问有此理无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

此事与舜象嘉意一般,须详看舜、周公用心处。《尚书》文颠倒处多,如《金縢》尤不可信。”<sup>⑤</sup>甚或有人认为其事也不可信,如明人马明衡《尚书疑义》卷五曰:“《金縢》之书,大有难晓。周公代武王之死,此事终有可疑。而又言其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自是鬼话。后世相传,皆以为周公至诚惻怛,欲输危急。余反之于心,终有所未安也。……故未敢苟信。今皆以为圣人之事,夫子所定之书,反复委曲,以求其解。不知夫子当时所定,果如是否?然《武成》之书,孟子亦疑之。在孟子之时,亦未经秦火,岂非夫子之所定耶?”<sup>⑥</sup>今人多衡之以文化人类学,认为周公请以身代武王死并不足怪,惟《金縢》之文自是后人追记文字,非西周初年之文,其成书最早当在战国中期<sup>⑦</sup>。

① 《文选》,第1353页。

② 蒙文通《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46页。

③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

④ 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⑤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⑥ 马明衡《尚书疑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册,第180—181页。

⑦ 张西堂《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页。蒋善国《尚书综述》,第236页。

《金縢》既为战国时人所作，则其言周公作《鸛鸣》之事或不可信。《金縢》的作者极可能是战国的儒者，其或为彰显周公“至诚惻怛”而曲尽其奇，并以上天示警以神其事。为增强其言说的真实性，遂又牵扯《豳风·鸛鸣》以资其说。盖时人说《诗》，或有以周公事说《鸛鸣》者。然考其时代，当为孟子之后。《孟子·公孙丑上》引《鸛鸣》文：“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并引孔子语：“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设想，若《鸛鸣》果出自孔子时《尚书·金縢》，云周公所作，或孔子时已有以周公事说《鸛鸣》者，以孔子尊崇周公的态度，当不至于模糊而言“为此诗者”，而应该称道周公并大加赞誉。不惟孔子不知，孟子也不知，故孟子引孔子之说而不言周公。

所以，先秦两汉之《诗》本事多系“取《春秋》，采杂说”，且大多为托古言事之作。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汉代经师在说《诗》时采用本事，有根据各自的说《诗》体系进行了一些修正，这在《诗序》表现尤为明显。

## 二 战国两汉时期《诗》本事兴起之缘由

尽管有一些《诗》本事传自久远，如《国语·祭公谏穆王征犬戎》中祭公引《周颂·时迈》曰“周文公之颂”，但绝大多数的《诗》本事当为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产物。如《左传》、《国语》成书于战国时期，而《韩诗外传》、《列女传》等书虽成书于汉代，但其材料多采自先秦旧籍，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共识。本事兴起之原初，或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强烈的鉴古意识有关。但问题是，为什么战国以至两汉时期会产生如此多的《诗》本事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私人著述意识的增强，涌现出大量的书籍，客观上为诗本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自春秋以来，周天子逐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力政，霸道兴盛。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礼益坏而乐益崩。旧的秩序已被打破，“封建”解体，士庶合流。于是官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解体，百家争鸣，文化勃兴，士人著述意识增强而撰作文化勃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论“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时说：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sup>①</sup>

在这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背景下，我认为至少有两类书籍大量涌现：其一是史书，此正章学诚所谓“述旧闻”之结果。正如《尚书》学史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尚书》中《虞书》、《夏书》以及《商书》中的一部分都是后人追记，其成书年代约当战国时。不仅如此，类似于西晋汲冢出土的《逸周书》以及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中的“《商书》类”作品也是后人追记，其成书也当战国时。关于《左传》，尽管经学史的叙述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是解释孔子《春秋》之书。与此同时，它也是“述旧闻”之书。同样的还有《国语》，《国语》中的材料年代先后不一，其被编辑成书也当在战国时，与《左传》相仿佛。其二是诸子之书，这是《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果。《庄子·天下》分析论述了古代道术由合而分的发展大势，庄子对此颇为惋惜，慨叹曰：“悲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然而“这一‘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正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即所谓‘哲学的突破’”。具体到中国古代文明，“哲学的突破”的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文化事务专家”——诸子，他们成为新思想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著书立说，于是乎有诸子之学和诸子之书<sup>②</sup>。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3页。

二是本事诠释有着非同寻常的诠释学价值,有助于文化典籍权威地位的确立。在战国这一政治、学术大变化、大动荡时期,可以想象,人们无论是重续道统还是重造道统,都势必会将目光投向经典以寻求支撑,试图借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来确认意义,正所谓“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sup>①</sup>。而经过历史检验之后,“《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因而最为人们所看重。其甚或被称为“经”,以示尊奉。缘此,战国时期便出现以六经为中心的經典诠释学,并有《易传》、《春秋》三传等經典诠释之书,以及大量记载解释礼乐的书,如《周礼》<sup>②</sup>、《礼记》<sup>③</sup>等。

就《诗》而言,也当有传。文献记载,孔门四教,《诗》居其一。故《论语》中孔子于古代典籍特别重《诗》,而上博简《孔子诗论》更证明孔子及其后学有论《诗》的专著。此外,《荀子》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韩诗外传》在解诗时常以“传曰”发端。凡此皆可证明,先秦时期当有《诗传》之存在。

不惟如此,先秦时期甚或有专门以本事解《诗》者。徐复观先生在比较《韩诗外传》卷一“行露之人许嫁”条、《列女传》卷四“召南申女”条、《诗序》对《召南·行露》的解释,以及《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卷三、《诗序》对《邶风·载驰》的解释后认为,“先秦本有一叙述诗本事并发挥其大义之‘传’,为汉初诸家所共同祖述,而不应强分属于某一家”<sup>④</sup>。徐氏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便是看上去差别很大的汉代不同《诗》派之诗说,经过仔细分辨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以《周南·芣苢》为例,李善注刘孝标《辨命论》引《韩诗》以为“《芣苢》,伤夫有恶疾也”<sup>⑤</sup>。刘向《列女传·贞顺篇》也以为是宋女嫁于蔡,不因夫有恶疾而改嫁,并作《芣苢》以明志<sup>⑥</sup>。两者的解释基本上是相同的。再看《诗序》的解说,其首序<sup>⑦</sup>曰“后妃之美也”,这是诗之乐章义,并非其辞章义。其续序曰:“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所谓的“乐有子”,与《韩诗》、《列女传》之夫有恶疾,人道不通等说相类,说明《诗序》也将《芣苢》解释为与生育相关的诗。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甚至不排除多种《诗传》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同一首诗却有不同本事,如《王风·黍离》,《诗序》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太平御览》卷四六九引《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离离,黍貌也。诗人求亡不得,忧慙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sup>⑧</sup>刘向《新序·节士》以为是卫宣公之子寿悯其兄伋将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sup>⑨</sup>。所以我们推测,这些不同的《诗》本事出现在不同书中,或者不同的《诗传》中,汉代经师说《诗》时各取所需,故有此分歧。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汉代《诗》家采纳本事时以意改之,甚至另创新说的可能。

那么,作为一种诗学诠释方法,《诗》本事的价值何在?它对于战国时期的經典诠释有何意义?

①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② 《周礼》成书有周公手作说、西周说、春秋成书说、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说、汉初成书说、刘歆伪作说等诸多的说法,但影响最大的当属战国说。近代以来,郭沫若、钱穆、顾颉刚、杨向奎、范文澜、齐思和、钱玄皆持此说。

③ 讨论《礼记》成书,应当着眼于篇。其绝大多数篇章应该成于先秦,如郭店简、上博简都有《礼记》篇章。

④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徐先生在此说“不应强分”乃是针对清人三家《诗》研究而发,并非说汉代《诗》学无差别。

⑤ 《文选》,第2347页。

⑥ 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⑦ 古今对《诗序》文辞的称呼差异很大,有“首序”、“续序”,“小序”、“大序”,“古序”、“后序”等多种称呼。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惯例,称《关雎》序中“风者,风也”至“诗之至也”为“大序”,其余每首诗前序为小序。其中小序的首二句为“首序”,其他为“续序”。

⑧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55页。

⑨ 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战国时期,诗、乐分离,《诗》的乐章义逐渐让位于辞章义。而就辞章义而言,《诗》学诠释也面临转型。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称《诗》为“义之府”<sup>①</sup>,都只是把《诗》视为仪典之书和言说之资。孔子论《诗》,曰“思无邪”,又曰“兴于《诗》”,包括其与子夏、子贡论诗都重在修身,论《关雎》也只强调其中和之美。近出的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论《诗》也首重进德修身,如其论《关雎》七篇<sup>②</sup>。孔子之后,社会变革加剧,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王官之学已转变为坐而论道、以道抑势的诸子之学。与此同时,《诗》、《书》等经典正逐渐演化为“经”,其意义的再诠释也势在必行。在这个“意义再发现”的过程中,本事正好找到了用武之地。其一,本事说《诗》较之训诂、义理更简切明白,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而更有利于意义的阐明。其二,借助本事,经典诠释得以确立唯一性和排他性。以本文语言作为阐释对象,其结构是开放的,允许有不同的阐释存在。换言之,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中,给出自己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解释“具有一种根本的偶然性”<sup>③</sup>。对于《诗》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其跳跃性的文本结构给读者留下的空间更大,更容易造成言人人殊的阐释结果,故古人云“诗无达诂”。而本事则不然,它借助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将解释固定下来,从根本上排出了其他解释的存在,所以便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概言之,便是借本事确立本义<sup>④</sup>,以此来确立经典及其诠释的权威地位。

到了汉代,本事说《诗》被今、古文《诗》学普遍接受。尤其是《毛诗》,通过对本事作了一些取舍和修正,使其《诗》学诠释进一步精细化,并具备完备的体系。如《邶风·二子乘舟》,《新序》认为是傅母作,而《诗序》认为是国人作。就事件而言,傅母作为知情者而作诗当然更加可信,而《诗序》将之改为国人则扩大了诗的政治意义,将诗从情感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这样的修改及其彰显出来的阐释差异,大量存在于《诗序》中。而《关雎》篇首的《诗大序》,以及《诗序》之“正变”、“四始”等理论,则体现了《诗序》本事诠释的系统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郑玄更进一步作了总结,使之进一步完善<sup>⑤</sup>。所以我们认为,汉代《诗》学视野中的本事,实际上具有阐释和逻辑体系构建的双重功能。后世《毛诗》之所以取代三家而一枝独秀,实与毛、郑对《诗序》本事体系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总之,战国两汉时期《诗》本事,尤其是那些虚构本事的产生,与《诗》的经学诠释有关。钱基博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sup>⑥</sup>故经学诠释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政教行事之实”,以消弭历史与现实之间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理解困难。而本事恰好是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的叙事,借助本事,六经中蕴含的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得以具体呈现。《诗》自不能外,不然其又何以能成为史鉴,成为施诸现实政教的“谏书”呢?

### 三 《诗》本事与“诗本义”

从经学阐释学的角度分析,《诗》本事的产生有其历史因素和功利性的背景。而具体到某一首诗,相关的本事具有什么意义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了一首诗的阐释呢?

《诗》本事作为一种说诗形式,其最本质特征便是以本事确定本义,通过交代诗歌创作的背景去解读诗歌。一般说来,本事对创作背景的交代主要关涉两个方面,即作者参与的生活事件和作者的创作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称赞郤穀时所说。

② 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73页。

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页。

④ 作为诠释学术语,“本义”一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

⑤ 王国维在《玉堂生年谱会笺序》中说:“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诗人之志也。”(《观堂集林》卷二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1页)

⑥ 钱基博《经学通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页。

心理<sup>①</sup>。正是凭借这两方面的信息所建立起来的标尺，后世读者可以探知作者的写作意图，或分析作品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从而了解作品之本义。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去解读作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研究方法。孔子曾提出“诵诗论世”的说《诗》方法，《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载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孔广森补注：“‘诗世’者，诵其诗，论其世也。《周礼》曰：‘讽诵诗，世奠系。’”<sup>②</sup>孟子则明确提出“知人论世”，为其“以意逆志”之说诗理论张本。在孟子看来，说诗者欲不以辞害意，则需探寻作者之志。欲探寻作者之本志，则需知人论世，即要明其本事。《孟子·告子下》记载，高子评《小雅·小弁》为“小人之诗”，理由是《小弁》文辞怨愤。而孟子认为高子说《诗》固陋，是典型的“以辞害意”。也许在孟子看来，尽管“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正统的儒家“中庸”观，符合孔门《诗》教，但“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论《诗》也要知道变通。读《小弁》不仅要看到它言辞激切的一面，也应结合作诗之实际，即考虑“亲之过”的大小。“《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而且“《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在说解《小弁》时曰“亲之过”，曰“亲之过大”，这说明他有本事作支撑<sup>③</sup>。凭借本事，孟子突破文本，逆得《小弁》之“志”，知其“怨”为“仁心之发”，由此探得诗之“本义”。

当然，《诗》本事有真有假。真的《诗》常常见诸史书，尽管它们大多叙事简洁，但足以确定理解的方向，并规范后世的阐释。例如《秦风·黄鸟》，因为有《左传》文公六年记载又加之诗文自身的内证，所以先秦两汉以来的解读基本上围绕“哀三良”展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又如《大雅·桑柔》，《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的秦伯语，点出是周厉王时芮良夫所作，再加之诗文自身明晰地叙述，便足以保证后世探得《桑柔》之本义。

对于杜撰的虚构本事，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那些仅仅为了某种说教目的而虚构或附会的本事，自然有很大的可能会曲解诗旨。如《周南·汝坟》，《列女传·贤明篇》杜撰出周南大夫之妻能匡夫的故事，此与《汝坟》诗旨绝然不类。《汝坟》三章，第一章之“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第二章之“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显然是女思男、女悦男之辞。而第三章曰“鲂鱼赆尾，王室如毁”，闻一多说诗中的“鱼”是男女双方互称其对方的度语<sup>④</sup>，而孙作云认为“王室”如《桑中》的“上官”，是媒社神庙<sup>⑤</sup>。总之，《汝坟》当是一首男女间恋爱的情歌、男子怨时思家之辞，与“匡夫”毫无关系。至于《诗序》，其根据《左传》系联诗本事与诗篇，牵强附会之处更多。如《郑风·将仲子》，《诗序》曰：“《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其以“仲子”为祭仲，然后以《左传》记载的郑伯克段之事说《将仲子》。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朱熹在《诗序辨说》中引莆田郑氏语：“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误益甚矣。”<sup>⑥</sup>

① 余才林《唐诗本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②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页。

③ 关于《小弁》本事，汉代《诗》有两说。今文《诗》家说以伯奇之事，如赵岐《孟子章句》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诗也。”又，王充《论衡·书虚》：“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汉书·冯奉世传赞》曰：“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盖皆以为伯奇作《小弁》，或《小弁》之事与伯奇有关。据《说苑》及《琴操·履霜操》记载，伯奇至孝，但为后母所谗害，被其父放逐。而《诗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认为诗写周幽王信褒姒之谗言，放逐太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闵其见逐，故作此诗以刺王。但无论如何，先秦两汉《诗》说认为《小弁》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纠结。

④ 闻一多《诗经通义甲》，《闻一多全集》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6页。

⑤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11—313页。

⑥ 朱熹《诗序辨说》，《朱子全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但我们讨论本事之阐释价值不能简单地以本事的真伪论。有些本事虽然是杜撰的，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篇。因为说诗人在杜撰或附会某种本事时，事实上是以他们对诗歌理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根据诗歌的内容或表达的情感来选择或编撰某种本事。如《周南·汉广》，近出的上博简《孔子诗论》评《汉广》为“智”，因为《汉广》之人“不攻不可得，不求不可能”。这与《诗序》之“《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相同，也与《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南游于阿谷之隧考验浣纱女子说明的伦理教化意义也相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先秦两汉时期解说《汉广》主要围绕礼之教化展开的。但有趣的是，《韩诗内传》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以为《汉广》本事，即郑交甫遇汉水女神事。故事本身自然是荒诞不经，也绝无可能是《汉广》的本事。但故事所叙述的求女事件以及故事中郑交甫失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怅惘之情，与《汉广》非常切合。很显然，《韩诗内传》以汉水女神事说《汉广》是把这首诗当作了情诗，故李善注曹植《七启》引《韩诗叙》曰：“《汉广》，悦人也。”<sup>①</sup>而汉水神女故事及“悦人”之解说，不仅颠覆了《汉广》解说中原有的政教传统，也恢复了《汉广》的本来面目。同样，《列女传》谓《大车》为息夫人殉情诗，事虽不真，然则“情诗”之定位比《诗序》“刺周大夫”之解说更贴近诗旨。

甚至于有时一首诗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本事，尽管都系杜撰或附会，但却可以互通或共存。作为对诗歌的解读，这些本事只是解读的角度不同而已。以《邶风·柏舟》为例。文献记载的《邶风·柏舟》至少有两种本事，《诗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而《列女传·贞顺篇》认为卫宣公夫人诗。《诗序》所谓“卫顷公之时”自然无据，或正如朱熹所言：“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sup>②</sup>但《列女传》以为卫宣公夫人作诗也难以确证。《诗经》学史上这两说互相驳难，争执不下，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就诗意而言，弃妇与逐臣事异而情同，故两说本质上并无二致。或以为《柏舟》诗中“泛舟”、“遨游”皆男子事，“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不类妇人言，故宣姜不可能作《柏舟》。其实也不然，《邶风·泉水》、《邶风·柏舟》、《卫风·竹竿》都言及女人出游或泛舟，而《郑风·女曰鸡鸣》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也可证明妇人饮酒。所以，就本事真伪论，无论是卫顷公无道还是卫宣姜贞一皆非《邶风·柏舟》之本事；而就诗阐释而言，将《邶风·柏舟》解为忠臣之诗或贞妇之辞都大体符合诗意，故可以共存。同样的如《王风·黍离》，将之牵合伯封求兄不得，或弟寿忧伋将见害，或周大夫悯宗周之灭，皆于史无征，难以确证。但从诗的情感层面来看，《黍离》之人那种悲愤深沉而又孤立无助的情感抒发可以理解为丧兄之痛，也可以理解为亡国之悲。

所以，无论是真实的本事还是杜撰的本事，皆有其价值。真实的本事告诉我们这首诗应该“这样”读；而杜撰的本事则告诉我们这首诗曾经被“这样”读。正因为如此，本事批评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式。魏晋六朝时期产生了许多诗本事、文本事，唐代有集本事批评之大成的孟棻《本事诗》出现，后世则有大量《续本事诗》、《本事曲》、《本事词》等以“本事”名篇者，故《四库全书总目》以“旁采故实”将本事批评列为诗文评五例之一<sup>③</sup>。

#### 四 《诗》本事的文学价值

本事需要借助历史或生活事件来确定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通过编造的故事传达诗歌文本创作的

① 《文选》，第1584页。

② 朱熹《诗序辨说》，《朱子全书》第一册，第361页。

③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9页。



历史信息，试图在具体的语境中还原文本。这样，本事便成了叙事性故事文本，并具有文学性。而虚构或杜撰的本事，其文学性尤其强。因为这样的本事多系有意为之，故需精心编造，欲使人信其真。因此大多数的《诗》本事有情节，有人物形象，而且其中不乏精彩篇章。以《邶风·二子乘舟》与《王风·黍离》之本事为例。《新序·节士》记载：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之毛传说解中，其曰“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碍也”<sup>①</sup>，便是把“二子乘舟”视作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在《新序》中，“二子乘舟”本身就是一个具体事件，是密谋杀伋的一部分。本事说“傅母恐其死”，显然是没死，也就预示事件还没有结束。所以《新序》本篇接着写到：

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而杀之。寿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为前，窃伋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伋至，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谗也。这样就把整个故事的曲折过程写出来了，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并借此突出了伋、寿勇于赴死的道义精神。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又刻画出了不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比如通过伋不弃父命之言以及载寿尸至境而自杀之行，突出伋为臣、为子、为兄之忠义。而寿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这则本事着力表现的人物。本事通过两次救兄，一次代死，塑造出一个孝而义的弟弟形象。

不仅如此，《诗》本事常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本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本特征，它常常结合作品来展开情节，作品自身的文学性，尤其是其情感内质常辐射到本事中来，从而增强本事的文学色彩。其突出的表现是，本事喜征引诗中最具感情色彩的诗句，以渲染故事中人物之感情。如上引《大车》本事之息夫人吟诵“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的诗句，与丈夫一起悲情自杀，表现出对爱的忠贞。而《黍离》本事中，寿也同样吟“忧思”之诗，伋则“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之情深与境遇之悲惨，让读者为之动容。而在《韩诗》所记载之“黍离”本事中，作者特意申说“诗人求亡不得，忧慙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而《列女传·母仪篇》记载的《燕燕》本事，通过“恩爱哀思”、“悲心感恻”等富有感情色彩的描述，并反复强调“送”、“望”、“泣”等动作，以表现定姜送归妇时的内心情感变化。

为了丰富历史事件，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诗》本事常常会变更历史叙事，虚构一些情节和内容。虚构是文本文学性的重要表征，虚构通过细节的补充和心理的刻画，使事件完整，也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尤其重要的是，虚构使作者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它可以“根据资料来源的情况增补或重写叙事”，将历史人物移入虚构世界中，甚至改变人物的个性化属性和生活情节<sup>②</sup>。在上举的《二子乘舟》本事与历史本事有很大的不同，《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1页。

② 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

对比《左传》就会发现，作为虚构叙事的《诗》本事对历史叙事作了较大的改变，增加了二子乘舟、寿作《黍离》以及急子自杀等情节。在细节方面，则增补了密谋、偕行、戒寿、盗旌等情节。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叙事的原貌，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

事实上，很多《诗》本事都可以作如上分析，尤其是《韩诗外传》、《列女传》、《新序》等书中记载的本事，它们在文本上明显呈现出小说的特征。这既与汉代小说发展水平有关，也和刘向等人的书写观念有关<sup>①</sup>。

《诗》本事依附《诗经》而存在，又加之许多《诗》本事是生动的文学文本，所以有许多本事中的事件和人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取材对象，或文学母题。我们以《小弁》本事为例。

正如上文所说，至少在孟子时代，已经流传《小弁》本事，故其能明确以“亲过”之大小说诗。据《后汉书·黄琼传》李贤注及《汉书·冯奉世传赞》颜师古注所引《说苑》记载的伯奇事，大抵可知先秦时期《小弁》本事之面貌。李贤注所引《说苑》稍详，兹录如下：

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后母欲其子立为太子，说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于后园，妾过其旁，王上台视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园，后母阴取蜂十数置单衣中，过伯奇边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杀之。王遥见之，乃逐伯奇也。<sup>②</sup>

今本《说苑》无之，李贤注及颜师古注所引当为《说苑》佚文。就故事内容而言，它表达的是忠而被谤，孝而罹祸的忠孝之人的不幸遭遇。其矛盾冲突的展开一般有比较固定的模式，矛盾的焦点常常是王位，大多涉及父、后母、前母之子、后母之子。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故事中的前母之子常常成为悲剧性人物。史书记载的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卫宣公的太子伋等均属于这种类型，人们也以此为蓝本创造了诸多的这一类型的故事。李贤注所引《说苑》也许不是完篇，所以我们不知道故事中的“王”到底指何人。到了汉代，伯奇故事流传颇广，如《韩诗外传》卷七之“伯奇孝而弃于亲”，中山靖王刘胜《闻乐对》之“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壶关三老令狐茂《救太子据书》之“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等皆可证<sup>③</sup>。但这些汉初的文献中，仍只是突出伯奇至孝，故事情节也止于伯奇被逐。但至少在西汉末年，伯奇故事已被谱之于琴曲，故事的主题与人物、情节发生了变化。扬雄《琴清英》曰：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唯念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sup>④</sup>

这说明在扬雄时代，有托名尹吉甫的琴曲曰《子安之操》，突出的当是尹吉甫的悔悟和痛惜之情，与《说苑》仅渲染伯奇至孝已经不同。同时故事的情节也有了变化，写到了伯奇之死以及死后之孝思，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的悲剧性。到了蔡邕的《琴操》，故事情节进一步复杂化。《文选》马融《长笛赋》李善注引《琴操》曰：

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后妻，生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曰：“见妾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曰：“试置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

① 马振方《〈韩诗外传〉之小说考辨》，《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9页。

③ 分别见于《韩诗外传》，第257页；《汉书》，第2425、2744页。

④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2608页。

伯奇乃作歌感之于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辞。”吉甫乃求伯奇，射杀后妻。<sup>①</sup>

李善注所引《琴操》之伯奇故事情节曲折，且伯奇未死，谗人终受到惩罚，表达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和美好愿望。但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悲剧性力量，使整个故事显得平淡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引蔡邕《琴操·履霜操》与之不同，且记有《履霜操》辞，似乎更符合《琴操》原本。其曰：

《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棹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终，投河而死。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谁能流顾兮知我冤。<sup>②</sup>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履霜操》辞，它用一首骚体诗，表现出伯奇内心的摧伤，而且骚体的形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并最终投水而死的贤良君子屈原，正如《汉书·冯奉世传》赞所说：“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曰：‘心之忧矣，涕既陨之。’”由此可见，汉人歌咏伯奇，一方面是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忠臣孝子的颂扬。

在曹植《令禽恶鸟论》中，伯奇的故事更加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故事中，伯奇死后化为鸟与父相认，其悲伤之表达与人无异<sup>③</sup>。而读者在体会并同情伯奇冤屈的同时，似乎也看到作者曹植的影子，体会到曹植内心的悲伤。

故事性的敷衍之外，还有诗歌。如韩愈的《履霜操》：“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sup>④</sup>韩愈此诗颇受后人好评，朱彝尊称之“通首精工”，程学恂认为这首诗得《小弁》之怨，而陈沆甚至将之与韩愈的《潮州谢表》相联系<sup>⑤</sup>。

伯奇之外，息夫人、秦之三良等也是人们经常歌咏的对象。如息夫人，宋之问、王维、杜牧、罗隐等皆曾赋诗歌咏息夫人对爱情的忠贞。宋之问《息夫人》：“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sup>⑥</sup>

以上我们探讨了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本事。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学诠释的方法，《诗》本事具有确立《诗》经典地位的价值。作为一种文学阐释的方法，《诗》本事揭示了诗文本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内涵。而作为一种故事文本，《诗》本事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及文学再殖能力。此外，有些命题还可以讨论，如从本事的角讨论《诗序》作者、作年，本事与秦汉时期小说文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诗》本事到《诗本事》、本事批评的发展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作者简介] 曹建国，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等。

① 《文选》，第810—811页。

②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3页。

③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④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页。

⑤ 所引俱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1166页。

⑥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1页。